

东方书店：

搭建中日出版交流之桥

赵霞



东方书店标志牌。图片来自东方书店官网

漫步于日本东京的“书店街”——神保町，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家特别的书店：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望去，中国图书或中国主题图书琳琅满目，有序地摆放在目之所及的每一隅，这便是东方书店。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书店，从1951年诞生之日起，这家邻邦书店便承载着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拉开中日出版交流序幕

1951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年，在极东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1966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方书店。1967年，东方书店开设京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町。1971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业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资料显示，东方书店自1973年至1988年，从中国进口图书的发行量长期超过10万册，发行量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可谓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中国期刊。20世纪80年代，安井正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1975年，东方书店创办《东方》杂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目。由于该杂志刊载了大量中国图书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界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杂志。2021年，《东方》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转为线上的“WEB《东方》”平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

会。从1986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参会。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杂志约1.5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2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质信息载体。

接力坚守对华友好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中国书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走向友好的未来。”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1983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任日本销售中文刊的同业组织“中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年，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的外国专家。2014年，山田真史因“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离不开几任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出版图书品类丰富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出版家王仿子在1987年统计的数据，东方书店“1986年的营业额达到破纪录的17亿日元，为1977年的2.2倍；利润为1977年的7.6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1010个结果，仅2019年到2024年7月就已出版图书113种。比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62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拥抱数字时代新需求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示，2023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



东方书店东京店在社交网站上推荐中国主题图书。图片来自东方书店社交媒体

探索从翻译视角研究历史事件

——读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夏尔尼访华使团》

谢贤良

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夏尔尼访华使团》（东方出版中心），是首部从翻译角度研究马夏尔尼访华事件的著作。全书分为7个章节，以时间为轴，分别交代了马夏尔尼访华的时代背景、译员选择、前期预告、礼品清单、国书传递、敕谕下达、后续影响等内容。作者王宏志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马夏尔尼访华事件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考索钩沉，提出了许多有力的新观点。其中既有对重点事件的关注剖析，如英方选择翻译人员的过程与标准、乾隆皇帝接见使团的过程、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的作用；又有对细节问题的抽丝剥茧，如不同版本礼品清单的翻译策略、使团与和珅等官员的通信、国书与敕谕翻译中

的遣词造句等。翻译过程中，有着惹人发笑的误会和差错，更有许多洞见发人深思，充分展示了跨文化语境交流的复杂性。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夏尔尼访华使团》材料丰富、论述严谨，作者收集材料档案全面广泛，不仅辗转英国、意大利、梵蒂冈等地搜寻多门语言文献材料，还得到多国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关机构及多位学者支持，掌握大量前人未见的珍稀档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不同年代的材料汇于此书，也照见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学术格局。

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作者不因袭旧说，而是致力于廓清历史细节，还原历史语境。比如在分析译员

10918家，这一数字与2003年的20880家相比，20年间锐减了近一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前身为推特）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SNS收集读者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30余年，他在2024年4月份的采访中说到，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较之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书出版成果。2024年，东方书店与上海地图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崎嵘的报告文学《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全方位展现了浙江和四川广元东西协作实践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刻画了两地干部群众的生动形象，展现了他们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远方的山水》题材独特，写作难度大。这部作品主要写上世纪90年代起，浙江由经济上定向扶贫四川广元，逐步扩展到两地全方位协作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地域涉及广元市四县三区，采访对象涉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当事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搜集资料和收集资讯，获得亲历亲见的切身感受，陈崎嵘深入一线，采访了250余人，翻阅了上百万字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资料，深入挖掘浙江对口帮扶、“5·12”地震灾后援建、东西部扶贫协作、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中的典型事例，创作完成此书。

《远方的山水》饱含温度，塑造了鲜活的人物群像。作者特别以事件中的人物为主，写出了一个个当事人的光彩。如原苍溪县委书记李文元、县长莫异矩，深感经济落后的苍溪需要向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取经。浙江省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深表理解，而且热情支持，先后安排娃哈哈集团、杭州中药二厂等企业派人去广元苍溪，根据当地所需进行切实支援，并推荐桐乡市对苍溪县进行一对一对口支援。这是浙江与广元开展协作的初始阶段。作品将肩负带领人民脱贫致富使命的李文元、莫异矩等人，心系四川家乡父老乡亲、把广元脱贫致富当成与浙江发展同等大事来办的浙江省领导等人塑造得鲜

活立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改革者、创业者、先行者的鲜明特征。

这部作品看似在写浙江对广元的精准扶贫，浙江与广元的协作实践，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件和独特案例，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意义等揭示出来。二者之间的协作，凸显了全国一盘棋、先进帮后进、共同奔富裕的体制优越性。

书中独特的角度、典型的案例、非凡的成果、成功的实践，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精神的重要性，充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特点。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具有画龙点睛的重要意义，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北京地坛公园：

书市觅书香



中秋假期，北京不少市民前往地坛公园，在“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度过中秋佳节。本次书市展销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设置“旧书新知”专区、童书亲子阅读区、外文原版图书专区等10个展区，汇集来自全国的出版机构、实体书店、特色展商超330家。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呈现不同时代女性成长经验

本报电（张倩婧）白露时节，“生活是永无止歇的风——辽京《白露春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学者、评论家张莉，作家李静睿，媒体人余雅琴与《白露春分》作者辽京围绕本书展开交流，探讨自我与家庭的复杂互动，并就不同时代的女性经验等话题展开讨论。

《白露春分》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有关家庭与亲情的故事。京郊退休工人秀梅一手带大孙女佳圆和佳月，祖孙三人关系亲密。随着秀梅衰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三代人组成的大家庭经历了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中的一系列变故，佳圆和佳月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也开始走入对方内心，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生。

“《白露春分》写的是家庭生活，而不是家庭生活的‘问题’。”这部作品从生活和人本身出发，把人当作人、把生活当作生活，而不是

把它们当作“问题”，这是《白露春分》最打动张莉的地方。“‘白露春分’这个名字有一种中文所特有的时间感，这是两个节气的名字，代表两个季节，既是自然的季节，也是人生的季节。人生的春天和人生的秋天，是这部小说写作的两条重要线索。”辽京说。



1793年，英国派马夏尔尼使团访华，这次远渡重洋的跋涉揭开了中英官方直接接触的序幕。以往学界对这一历史时刻的关注多着眼于故事性细节，如两国赠答礼物的薄厚、觐见礼仪的争执等，往往忽略了语言翻译的问题。在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鸡同鸭讲”的误解，又如何通过“信达雅”的转译取得共识，其间种种耐人寻味。

获得第十九届天津图书奖的《龙